

中國倫理之演變及其精神

吳鼎

一、緒言

嘗考「倫理」一詞之含義：按「倫」字本訓爲輩，從「人」從「侖」，乃人群相處之關係；「理」字訓爲治玉，引申爲區分之義，指條理秩序而言。故「倫理」一詞，便是人群相處關係的法則；其作用在使人各守其分，各盡其責。總統蔣公對「倫理」一詞，有簡明而正確的解釋，他說：「倫就是類，理是紋理，引申爲一切有條貫、有脈絡可尋的條理，是說明人對人的關係。這中間包括分子對群體的關係，分子與分子間相互的關係，亦即是人對於家庭、鄰里、社會、國家和世界人類應該怎麼樣，闡明他們各種關係上正當的態度，訴之於人的理性而定出行爲的標準。」（見政治的道理）可知所謂「倫理」，從中國字義上言之，即是人與人相處的法則，也就是做人的道理。

英語「倫理」一詞，爲 Ethics 原於希臘文 *ethos*，其義爲 morals，謂即習慣與風俗 usage and custom。所謂「習慣」與「風俗」，皆由人類行爲所造成，人類行爲也就是人與人相處關係的表現。所以就廣義言，中西「倫理」的意義是相近的；不過西洋研究倫理的學者，都偏重於狹義的看法，認爲倫理是討論人類行爲的；如麥肯西云：「倫理是行爲的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爲的是非或善惡有關的。」（見 Mackenzie : Manual of Ethics 頁一）杜威與塔夫茲合著倫理學也有相同的界說。（見 Dewey and Tufts : Ethics 頁一）可見西洋學者皆認爲倫理是討論人類行爲的科學。

中國倫理所討論則不限於人類行爲。中國先哲對於倫理範疇看得比西洋學者要大得多。他們認爲倫理是人生理想和人生觀的啓示，行爲標準和道德實踐的指導，是一種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學問。這是中國倫理與西洋倫理在功用方面不同的地方。而中國倫理，淵源甚早，數千年來，已與人民生活融爲一體，不可分割，人民依此習慣方式，表現於一切行爲，形成一種傳統的風習，成爲國家民族精神所寄託，其重要更非狹義的西洋倫理所能比擬。茲就其演變軌跡，及其特有精神，綴成此文，以

請指教。

二、中國倫理之演變

自堯舜以迄周末，爲中國倫理發揚時期；漢唐以後受佛教道教之影響，形成中衰之勢；清末民初，由國父與總統之提倡，又呈復興之象，此其演變之概略也。茲分述之：

一、中國倫理之發揚

中國倫理產生甚早。尙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爲中國倫理之始。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解釋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這時已有倫理的內容。夏禹作洪範九疇，其中「皇極」「三德」「五福」「六極」四疇，皆爲倫理規範。語父子時，則極其親，天下之爲父子者，悉取則於此；語夫婦時，則極其別，天下之爲夫婦者，悉取則於此；語兄弟時，則極其愛，天下之爲兄弟者，悉取則於此；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使人類之行爲，皆合於大中至正之標準。此不過就「皇極」一項而言，至於其他三項，亦皆切合人民生活之需要。較諸舜之五教，已有進步。成湯之世，賢臣伊尹以化民自任。他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見孟子萬章篇）斯道就是倫理之道，伊尹自任以倫理之道教化人民。周興，文武皆爲有德之君，周公制禮作樂，奠定社會制度，對倫理發展有極大的貢獻。東周之際，王綱既墜，群雄並起，遂成春秋戰國之世，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百家爭鳴，其中孔子孟子先後繼出，發揚倫理，故中國倫理遂與儒家哲學成爲不可分之勢，也可以說中國倫理自堯舜倡導以來，歷經夏商周三代之充實改進，至孔子孟子始定其根基。

孔子以「智仁勇」三達德爲作人的標準，他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愛，勇者不懼。」（見論語）三者之中，特別着重一

個「仁」字，指爲立身治事待人接物的原則，而「仁」爲中國倫理的基本精神。論語一書，爲孔子言行記載，全書甚少直接談到倫理，然全書精義皆與倫理有密切關係。曾子爲孔子門高足弟子，闡揚孔子倫理哲學，本「人」爲中心的立場，成大學一書，（按大學一書，亦有人認爲曾子門人所作，但其中心思想，仍爲孔子一貫思想。）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項目，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從求知研究、建立觀念、奠定思想，以爲修身的基礎，並從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發展一個人的能力，既合於心理學的發展原則，又合於政治學的施行程序；由個人修身充實家庭倫理，而推展爲政治倫理，是一部倫理哲學及施行程序的好書。中庸爲孔伋所作。孔伋爲孔子嫡孫，家學淵源、衣鉢真傳，故中庸一書，亦可代表孔子的學說。中庸亦本「人」爲中心立場，提出一個「誠」字，爲作人的最高原則，也是中國倫理的精神所在。中庸還提出：「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這裡五達道即是五倫，推行五達道的即是智仁勇，而發揮智仁勇精神的，即是一個「誠」字。所謂行之者一也，這個「一」，就是指「誠」而言。所以中庸一書，對於倫理的原則，推行方法，敘述更爲充實。

孟子繼承孔子思想，倡性善之說，認爲人性本善。故「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說：「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矣。」（均見孟子）孟子之意，謂「仁義禮智」，皆出於人的性，故倫理之產生，就是順應人性的需要。

荀子雖主性惡，但却提倡「禮樂刑政」的客觀道德。所以他的倫理主張，注重禮義，認禮義爲教化的工具。他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見荀子禮義篇）他對於「禮」的看法，認爲「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人不可不學之。」（同上）荀子倫理主張，除禮義外，也注重樂。他以爲道德者，不外由人爲轉性惡而爲善。夫由人爲化性者，不得不有標準，故荀子揭禮樂爲標準。

以上所舉，皆儒家倫理學說之梗概。可見中國倫理，經儒家先哲之充實發揚，基礎穩固，歷經數千年，雖有盛衰起伏，迄今仍能深植人心，在世界學術中表現其獨特的光彩。

春秋戰國四百年間，儒家思想對於倫理固有其不可磨滅之功蹟。而當時之道家、墨家、法家等，其中除道家外，墨法兩家對於倫理皆各有貢獻。道家以其哲學思想之不相同，對於儒家倫理之主張遂持相反之意見。茲簡述如次：

道家：道家有老子、莊子、列子、關尹子等，而以老子為主。老子姓李名耳，為道家創始人。老子之倫理學說，以其哲學之根本思想為倫理思想之基礎。以「復歸於道」為倫理之最高目的。復歸於道者，為清虛無為，保自然之狀態。復歸於道之方法，（一）排人為，復歸於自然；（二）斥積極而尚消極；（三）重清靜恬淡；（四）謙虛不與人事。這四種方法，皆係消極出世之想，但却以「修己治人」為本，且能擴充其倫理為經世治國之理想。故就哲學觀點言之，亦不無貢獻。

墨家：墨家以墨子為主。墨子名翟，其倫理觀念，以為善惡之別，由天主之。天之所欲者義，天之所不欲者為不義。天之所欲者何？愛也，利也。故墨子以愛與利為道德之二大原理，而倡所謂「兼愛交利」之說。墨子以兼愛為倫理之中心，兼愛就是不但愛己，而且愛人，愛自己之親，如同愛他人之親。推演其兼愛，可用下列三法來說明之：第一、天無不愛。第二、堯舜禹湯文武聖人之愛萬民均無區別。第三、以兼愛治萬民則下天必治。墨子的交利觀點，以為兼愛與交利，是不可分的。交利就是提高人類一般的幸福。據墨子之意，兼愛即交利，故廣愛人類，就是廣利人類。墨子說：「視人之國如己之國，視人之家如己之家，視人之身如己之身」，（見墨子兼愛篇）則天下不亂，人民自然幸福安樂。所以墨家倫理學說，在方法上雖與儒家不同，在目的却與儒家一致。

法家：法家有管子、申子（不害）、商子（鞅）、韓非子等，而以管子為主。管子名仲，字夷吾。倡法制主義，以為儒家之德治主義。儒家認為人類本具有鞏固之道德心，若以法臨民，外表似受支配，其精神上不能服從。法家則認為人類之道德心薄弱不足恃，且以德治國，每因君主之賢愚而生人民之幸與不幸：遇賢明之君主，人民得蒙其恩澤；若遇暗愚之君主，人民不得不泣於虐政云云。這是儒法二家倫理思想根本不同之點，以現在政治學觀點看來，二者各有見地，實可相輔相成。法制主義

之目的在富國強兵；管子的治國三綱領：第一是富民，富民的具體方法：休養民力，節約以免浪費，經營山林沼澤，整頓水利，大興蠶絲，獎勵牧畜等，這是富民的要訣。第二是教民，教民的方法，以四維爲主。故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又云：「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又解釋云：「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不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均見管子）管子以爲不越節度，不自冒進，不蔽罪惡，不從枉邪，爲道德之四綱領。教民與富民有因果關係，故云：「倉廩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是禮義廉恥之實踐，又從富民而來。第三是尊敬神明，以爲若不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則君主之威令不行，不能期國內之和平。蓋尊敬神明，爲一種精神感召，旨在示民以敬，善守法制，和睦不爭。這是法家倫理思想的大概。管子用以相齊桓公，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果然達到富國強兵之目的。孔子稱讚管子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又說：「如其仁，如其仁！」（均見論語）可見儒家也極承認法家的倫理思想與辦法。

統觀自堯舜以來，歷經夏商周三代，爲中國倫理發揚時期，且以儒家思想爲倫理之正宗，墨法兩家思想，亦爲儒家所容納，故中國倫理基礎，至此已趨穩定，其後歷經二千餘年，雖幾度衰微而仍能保全的根蒂者，完全由於此深厚基礎，深入人心，並得歷代儒者之倡導，故能維持至今，猶有復興之望也。

一、中國倫理之中衰

漢代承嬴秦之世，秦始皇焚書坑儒，對中國文化有不可思議之損失，繼之楚漢相爭，社會動亂，民不聊生。故秦代倫理思想，毫無表現；所幸爲時甚暫，就整個倫理傳統言，尚不致發生大的影響。漢初國勢粗安，高祖大封同族子弟以爲漢室輔翼，未幾諸王專橫而漢室大亂；此一時期，亦無倫理可言。迨文景二帝，政簡刑輕，與民生養休息機會，始漸恢復元氣。武帝承文景之後，遂能大展雄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於是儒家學術，「唯我獨尊」，遂成爲中國正統思想矣。其時道家思想，並未根絕，由於漢初人民疲於多年之苛政與兵亂，對人生問題深覺煩惱，道家無爲自然之說，深洽民心，故通前後兩漢時代，

道家思想，仍據有潛力。及東漢明帝而後，佛家思想侵入，亦具相當勢力。道佛兩家思想自此以後始終與儒家並存，且給予儒家思想之影響極大。宋代學者欲自哲學上下功夫，希圖以性理之學來抵抗或調和道佛二家思想；雖不無苦心，然中國倫理精神，至此幾已變質，復非純粹儒家之倫理思想矣。其後歷經元明清各代，一蹶不振，是為中國倫理中衰時期。茲述之如下：

漢武帝好儒學，斥黃老百家，名儒相次而出。惟漢代儒者，尙訓詁之學，對倫理有貢獻者，亦僅董仲舒與揚雄等而已。董仲舒論人性，不承認人性有善惡，但認為性有為善為惡之可能性。善導其可能性，是教化之力。他主張教化的內容是「五常之道」，五常就是「仁、義、禮、智、信」。孔子舉倫理之德為三德（智仁勇），孟子舉倫理之德為四德（仁義禮智）。董仲舒就孟子的德目，增加一個「信」，成為五常。儒家倫理之德，至是更為完備。實則「信」字，孔孟亦皆言之，不過未明白指為倫理之德目耳。

揚雄為前漢大儒，著有大玄法言。其倫理主張，大體祖述儒家倫理精神，以孔孟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本，且述堯舜以來歷代先哲所講之「中」道，加以發揚。他認為人性成自善與惡之混合，養其善則為善人，養其惡則為惡人。其所以適於善、適於惡者由於氣，人之為善為惡，乃氣之作用。但氣為何物，則未詳言之。總之揚雄的倫理思想，與儒家倫理思想，其精神為一致的。

後漢的倫理思想，以重氣節，端士風，為其特色。不過在明帝時，佛教傳入中國，對思想影響頗大。後來，倫理思想中衰，道教與佛教殆為主要的原因。後漢學者，有王充、班彪、班固、王符、馬融、鄭玄、荀悅、仲長統、徐幹等，而以王充對倫理最有貢獻。

王充，字仲任。他認為一元氣為宇宙之本體；天地間之萬物，由一元氣之活動而生。一元氣分為陰陽二氣，相交乃生萬物。人之產生，亦與此同義。故云：「人者萬物也。」人與萬物之區別，生於智慧之有無，即人與萬物之不同，生自賢愚之差別。因此他認為人性，由於秉氣之多寡厚薄而有上中下三等之分。他說孟子倡性善，其所指之性，中人以上之性也；荀子倡性惡，其所指之惡，中人以下之性也，揚雄以為性混於善惡，中人之性也。所以他說：「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之有高有下。高不

可下，不下可高。」又云：「小人與君子，因稟性而異，故性有善惡。」他也承認性既有善惡，則以教化之力，有惡性者亦能爲善人，如白絲染藍則青，染丹則赤，其理相同。

魏晉之後，即爲六朝。六朝即所謂吳、晉、宋、齊、梁、陳是也。此一時期，各朝之盛衰消長，極爲複雜。倫理思想與時勢有密切之關係，不通時勢之大體，不能理解倫理思想，亦必然之趨向也。所以自三國以迄兩晉，戰亂頻仍，生民塗炭。其後五胡亂華，倫理蕩然。當時儒家道家並存，而佛家亦頗佔勢力。蓋以人民於亂世，苟全生命已屬不易，故多有消極遁世思想，或寄情於山水，嘯傲林泉；或流連於詩酒，終朝大醉。其中可以舉述者，顏之推一人而已。

顏之推生於亂世，乃極重親族關係。他認爲親族爲唯一之倫理團體，宜謀所以強固之道；以爲（一）夫婦、（二）父子、（三）兄弟，爲一家之三親；一切之親類卽九族，而以三親爲基礎。父慈則子孝；兄悌則弟恭；夫義則妻從順。感化常自上而下，故在上者不得不先守道德，以爲先率。顏氏重長上之道德，頗有卓見。他當時雖排斥老莊，却信仰佛教；他認爲佛家不殺、不盜、不邪、不淫、不妄之禁，正與儒家倫理之道相謀。不殺之禁就是仁，不盜之禁就是義，不邪之禁就是禮，不淫之禁就是智，不妄之禁就是信。他又著有「顏氏家訓」一書，宣揚倫理之道，在當時混亂社會中，頗爲難得。

隋唐之際，中國由分而合。隋初建立大帝國者，是爲文帝。文帝休養民力，國勢安定。至其子煬帝，好奢華，設離宮，開運河，起外征之師，以招國內之亂，遂爲唐所滅。先後僅三十六年，其治世甚短，學術思想，鮮有可觀。倫理思想，可傳者僅文中子一人而已。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文中是他死後的謚號。他的倫理學說，紹述儒教。根據堯舜以來歷代聖賢所重之「中」，爲其說之要點，其倫理學說亦卽「中」之解說。他分人性爲上中下三品；由學問之力，人人能爲聖人。並言學問之目的，在完成人格而爲聖人，彼徒競博學能文，非真學問也。這是文中子的卓見。他對倫理的觀點，取五倫說爲義務論，取五常說爲德論。五倫特重漢代儒者三綱說，卽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中特重仁義，以爲仁義乃教化之本，一般道德所由而生。更以禮樂輔助仁義。又認爲忠孝爲實踐道德。他說明忠孝之關係有云：「孝立時忠亦遂」。卽暗示忠孝爲一本之道德。其他說正

義，說忠恕等，亦皆爲實踐的道德。文中子承六朝風化夷淪之後，對於倫理的發揚，具有復興的作用。他本人思想，是儒家的正宗思想，所以他的倫理學說，對儒家貢獻特大。尤其是唐朝開國的一班英傑，如魏徵、李靖、董常、姚義、房玄齡、杜如晦、薛收等，皆有王佐之才，都出於他的門下。所以唐初倫理之盛，文化武功，皆與漢代並稱，實非偶然。

唐代因高祖、太宗之獎勵，儒學大興，儒家倫理思想，更爲社會的推重。尤以太宗篤信儒教爲濟世治國之要道，認儒教爲國家之正教，其後歷代君主，亦重視儒教。故唐代博學能文之人倍出。訓詁學者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等，文章家有韓愈、柳宗元等；詩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書家有顏真卿、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張旭等；畫家有吳道子等；其餘如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杜審言、王昌齡、高適、王建、杜牧等，亦各以詩文傳世。然詩文空前發達，致經義之研究不振，通唐朝二百九十餘年間，於倫理思想有所貢獻者，不過韓愈、李翱二人而已。其原因爲科學制度大興，讀書人畢其一生精力，以求一第爲榮。科舉制度本起其隋而盛於唐，歷經宋元明清而不衰，凡一千三百餘年，影響中國學術之發展，這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韓愈，字退之。世住昌黎，因以其地名爲號。他是唐代的大儒，原道一篇，頗有以繼承道統自命。他對於人性的看法，見於他的原性。他以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爲基礎，而倡性三品說。他又區別性與情，以爲性生時已有，情則接於物而後生。仁義禮智信，爲具於性者，卽性之所以爲性；喜怒哀懼愛惡欲，爲情之性質，卽情之所以爲情。性與情各有上中下三種：上者爲善，中者可導而上下，下者爲惡。又言性之上者，以信爲根基，而備仁義禮智；性之中者，不能完全有五性；性之下者五者俱無。又言情之上者，雖動七情而常處其中；情之中者，雖有過不及，仍復於中；情之下者，過不及而不復於中。又述性與情之關係，以爲性之上者情亦上，性之中者情亦中，性之下者情亦下。因此他對於倫理的主張，以仁義道德爲倫理之本，並且加以分別說明：「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於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見原道）他認爲仁義道德，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脈相傳的道統，可惜孟子死後，不得其傳。他認爲這個道統，可以適宜於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所以有人說，孔子的五倫，到了韓愈，變爲六倫了。可見韓愈本儒家思想，對於倫理發

揚保護不遺餘力，他終生反老排佛，完全基於護保儒家正統的倫理思想而來的。

李翹，字習之，始從韓愈學文章，名聞當時。他對於人性的觀點，認為性是善的，情是惡的。他區別性與情云：「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非性之過也。」據他的說法，性是善，其惑善性而生惡者，情也。不過，他亦非絕對認情爲惡。他曾說：「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又云：「性自然也，誠也。唯情可爲善可爲不善。」因此他認爲人若不惑於情，止於本性者，爲聖人；惑於情以蔽本性之善者，爲常人；至能斥彼惑本性之情，復於本性之善，則雖常人亦能爲聖人。所以他的倫理思想，以爲保其善性而不惑於情。他以爲性爲天所命，情由性而生，性爲本體，情爲現象，故保護善性可以不爲情所惑。這與儒家的「慎獨」「懲忿窒慾」等觀念，頗有相同之處。

降及五代，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共五十餘年。干戈相繼，世亂如麻，文化思想，萎靡不振，倫理道德，更無論矣。宋興，太祖登極之始，即獎勵儒學，太宗繼其志，命史官修太平御覽千卷；因帝王之獎勵，儒教大盛。其時道教與佛教亦各有勢力，乃常與儒教鼎立而爭其優劣。宋代大儒，如周濂溪、程顥、程頤、朱熹、陸象山、張載等，欲以性理之學，來調和或抵抗道佛二教之思想，因而性理之學隨之興盛；其後復演爲（一）程朱學派、（二）陸王學派、及（三）調和學派。各家門徒，成見日深，互相攻訕，所謂儒家之倫理思想，至此幾已完全變質。然自哲學觀點言之，其用意在探討原理，研究人性與宇宙之關係，固亦未可厚非，惟其範圍則脫離儒教倫理甚遠耳。元代以蒙族古入主中國，崇尚武功，不重儒術，中國倫理，所受壓力愈重。有明一代，凡二百九十餘年，程朱、陸王、調和各派，互爭勢力，僅陽明學說，值得注意。迨至明末，西洋宗教傳入，萬曆時許可建設天主堂於北京及各地。由是西洋文化東來，中國倫理思想又受一種壓力。滿清以滿族入主中國，雖重儒術、尊孔子。康熙、乾隆二帝，獎勵學術、編纂書籍甚多，如著名之四庫全書，收集十七萬二千餘卷，即成於乾隆時也。但其壓制民族思想，數興文字獄，遂使儒者僅能作考據之研究；因而清代之考據學大爲發達，通清代二百九十餘年，殆無新的哲學思想。及至清末，對外戰爭失敗，海禁大開，西洋物質文明，滾滾而來，國內人心爲之一變，認爲物質文明勝過精神文明，

故有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之倡議，而視中國數千年之正統倫理文化爲敝屣。故自宋迄清，約九五十年年間，爲中國倫理之中衰時期。

宋代迄清，倫理演爲性理之學，愈演愈玄，然鄉里間，仍存有倫理實踐意義者，厥爲各代之鄉約制度，及儒家學者之倫理規範而已。鄉約制度起於宋，明清兩代仿行。至儒家學者之倫理規範，如司馬光之家範、范仲淹之義莊，楊椒山之遺訓，朱柏廬之家訓等，亦皆發爲倫理之光，維世風於不墜。宋代鄉約以呂氏鄉約爲著名，按呂氏即呂大鈞，字和叔。四朝學案紀其事云：「橫渠（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指呂氏）於橫渠爲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先生條爲鄉約，關中風氣爲之一變，范侍郎（育）表其墓曰：唯君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得者踐之身，可謂至誠敏得者矣。」呂氏鄉約內容至爲詳備，茲摘錄其大綱如左：

(一) 德業相勵

(二) 過失相規

(三) 禮俗相交

(四) 患難相恤

這是呂氏鄉約中的四大綱。每綱之中，並規定實行細目及制裁方法。對於移風易俗，加強倫理觀念，有相當效果。朱熹根正呂氏鄉約，酌加損益，繼續提倡。一鄉之中，睦婣任卹，休戚相當，樹立社會優良風習，爲各地士紳所推重。司馬光爲名儒，據，色立朝，爲宋代第一等人物，正身以正一家，可爲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孫兄弟叔侄夫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懿行以實之，爲家庭倫理之要則，對當時世風，亦有扶正之力。范仲淹創辦義莊，其莊內組織，設有養老、恤嫠、養疴、育嬰、讀書、嚴教各單位，尤屬當時社會倫理事業之優良範例。

明代承元胡之後，洪武三十年頒行「聖訓六諭」，目標在安定社會，重視倫理。聖訓六諭的內容是：

(一) 孝順父母

(二) 尊敬長上

(三) 和睦鄉里

(四) 教訓子弟

(五) 各安生理

(六) 無作非爲

當時令每里選一耆父，手持木鐸，且行且擊，且擊且誦，以儆民衆。各地方以十家爲甲，百又十戶爲里，里有鄉約。其後王陽明又提倡南贛鄉約，採用宋代呂氏鄉約，和朱子的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實行彰善糾過的儀式。此外如楊椒山（繼盛）的遺訓，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委曲詳盡；朱柏廬的家訓，勸勤儉，戒奢華，亦皆家庭倫理之典範。

清代以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國，欲以少數之滿人，統制極大多數漢族之民衆，抑制民族思想，迭興文字獄，儒家學者，思想受其桎梏，聚其精力作「考據」之研究，故有清一代，考據學極爲發達。本來明末清初之際，大儒如顧亭林、黃黎洲、王船山、李二曲等，皆富於民族觀念及倫理思想之學者，然在滿清壓力之下，亦皆以學術終老。

考清代鄉約，始於順治年間。規定以「素行醇謹，通曉文義」者爲約正及約副、司講、司書等。每月朔望集公所宣講「六諭」。順治之「六諭」，仍沿用明代之「聖訓六諭」，一字未改。嗣於康熙九年，另頒「聖諭十六訓」，其條文如下：

(一) 敦孝弟以重人倫

(二) 篤宗族以昭雍睦

(三) 和鄉黨以息爭訟

(四) 重農桑以定衣食

(五) 尚節儉以惜財用

(六) 隆學校以端士習

(七) 黜異端以崇正學

(八) 講法律以儆愚頑

(九) 明禮義以厚風俗

(十) 務本業以定民志

(十一) 訓子弟以禁非爲

(十二) 息誣告以全善良

(十三) 誠匿逃以免株連

(十四) 完錢糧以省催科

(十五) 聯保甲以弭盜賊

(十六) 解讎忿以重生命

後來在雍正時，就「聖諭十六訓」各條而作衍諭，謂之「聖諭廣訓」。道光時又就各條作俗語解釋，謂之「聖諭直解」，梁延年又作「聖諭像解」，都是清代用作宣講倫理的材料。

清代末年，對外戰爭接連失敗，辛丑條約之後，海禁大開，清政府既懼於西洋之艦堅礮利，人民復惑於西洋之物質文明之引誘，舉凡一切家常日常物品，均仰賴外人供給，於是「洋火」「洋煙」「洋鎖」「洋傘」「洋布」「洋襪」……等，遂充斥市場，利權外溢，人民生活日益艱難，因而對固有之倫理文化，用懷疑而發生動搖。中國倫理至此，已呈萎靡之象矣。張之洞於此時曾提出「中學爲禮，西學爲用」的主張，他本是儒家學者，而且在政治上有崇高地位。他說：「以忠孝爲敷敎之本，以禮義爲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爲致用治生之具」，又說：「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勤學篇）他的意見，不失爲當時一種適應時代需要的辦法。但不久清代滅亡，他的思想也就無從實現。

綜觀自宋代以迄清末，中國倫理因種種之刺激，已由中衰而萎靡；所存者僅鄉約制度與少數學者之家庭倫理規範等，尙能保存其精神於民間而已。

(三) 中國倫理之復興

民國成立之初，軍閥割據，攻伐無已，民不堪命。兼之列強環峙，豆剖瓜分，迫於眉睫。尤以「五四運動」以後，全盤西化，高唱入雲，於是打倒「孔家店」，廢棄經典，提倡非孝。短識之徒，此唱彼和。中國倫理精神，至此不絕如縷。及共匪竊據大陸，更以澈底毀滅倫理精神為其主要手段。焚燬古書，改造文字，被壞道德，拆散家庭，鼓勵清算，於是子之弑父，弟之殺兄，凶殘惡毒，已臻極點，復強劃階級，製造仇恨，他們把「人」當做「物」，已不復有「人性」之存在。由是可知中國倫理精神，今日在大陸各地，幾乎完全毀滅矣。

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其超人之睿智，淵博之學識，敏銳之眼光，周密之思想，深知中國倫理，乃立國五千年來民族精神之所寄託，不容使其喪失；故於其所著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六講中，一再指示國人恢復固有的倫理精神與倫理道德之重要。根據歷代先哲所提之倫理德目，加以歸納整理，揭示「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以為實行之標準。又慮及國人誤於古人所謂「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觀念，發明「知難行易」學說以糾正之，此項「知難行易」學說，實為實踐中國倫理之動力。由此可知 國父實為歷史上恢復倫理之第一人。

總統蔣公秉承 國父革命遺志，掃蕩軍閥，統一全國，領導對日抗戰，收復澎臺，豐功偉績，舉世欽崇。他歷經憂患，深感國人倫理精神喪失，生活萎靡不振，故先後提倡「新生活運動」與「國民精神總動員」等以期振奮精神，恢復倫理；於 國父所提之「八德」外，並引用管子所提之「四維」，根據時代需要，予以新興而簡便易行之解釋，以使國人易行實行。並發明「力行哲學」，以為奉行三民主義，實踐中國倫理之動力。值此返攻復國時期，更主張恢復中國倫理以為消滅共匪之精神武器。是總統之恢復中國倫理，更為極積。茲將 國父與 總統之倫理思想分別述之如次：

一、國父之倫理思想 國父曾說：「我們中國有一個立國的精神，就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千年來歷聖相傳的『正統思想』，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義、就是從這個道統傳下來的。我現在就是要繼承我們中華民族的道統，就是要繼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歷代祖宗遺傳下來的『正統精神』」。（見國父答蘇俄代表馬林語）可見「正統精神」，就是倫理精神。所以 國父的倫理思想，是中國正統的倫理思想。

國父的倫理哲學，是以人性爲基礎。他講人類進化分爲三期：第一爲物質進化時期；第二爲物種進化時期；第三爲人類進化時期。他說：「……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以互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又說：「人類進化之目的爲何？即孔子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耶穌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又說：「達爾文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之學者多以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競爭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均見孫文學說）。國父又說：「由動物變到人類至今還不甚久，……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的性質。換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按所謂獸性，即自然的動向。所謂人性，就是理性，獸性在於人性之中，並不完全消滅，乃是因爲人性的控制而改變其表現的方式。這是 國父的倫理思想以人性爲本的根據。揆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倫理思想，是一致的。

國父的三民主義，是我國的立國主義。三民主義所根據的思想，完全是我國的倫理思想。就民族主義言，倫理思想主張「天生蒸民」，「有教無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 國父民族由王道自然力造成主張之由來。倫理主張「食舊德」，尊重先聖生存之經驗，爲 國父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智能主張之由來。倫理主張「齊家」與「宗族」的人倫關係，以安定社會，爲 國父主張以家與宗族爲團結民族之由來。倫理主張「以大事小」，「興滅繼絕」，爲 國父主張對內扶助弱小，對外自由獨立平等之由來。凡此所云，不過略舉數端，但已可見中國倫理與民族主義之關係了。再就民權主義言，所謂「堯舜的禪讓」，「咨於有衆」，「謀及庶人」，「民爲邦本」，「民爲貴、君爲輕」等，皆爲中國倫理注重民意的精神，爲 國父民權主義的由

來。復就民生主義言，所謂「富國裕民」，「庶而後教」，「足食足兵」，「不違農時」等，皆爲中國倫理注重民生的精神，爲國民生主義的由來。由此可知 國父的三民主義，實在是根據我國倫理思想而產生的，國父坦然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自任，就是這個道理。

國父既成三民主義爲建國方案，又慮及國人爲傳統的「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思想所誤，故發明「知難行易」學說以爲實行三民主義的動力。「知難行易」學說，爲國父一大發明，其精義比較歐美的知行學說與我國古時的知行學說爲正確與合理。國父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能從善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費時失事，以冀事半功倍之效也。」又說：「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之也。」這是 國父主張「知難行易」學說的道理，也是他的倫理思想實踐的哲學根據。

準上所論各點，可知 國父恢復中國倫理思想，不但訂出實施的方案（三民主義），並且發明實踐的方法（知難行易學說）

），統觀數千年來，中國歷代聖哲，倡導倫理學說，發揚倫理精神，無一人從及得上 國父倫理思想的完備。

二、總統之倫理思想 總統的倫理思想，爲繼承 國父的倫理思想而加以發揚光大的。蓋倫理思想之恢復，並非朝花夕實之事。民初軍閥割據，互相攻伐，干戈擾攘，民不聊生；兼之帝國主義野心撲撲，國勢危急萬分；且自五四運動之後，原有倫理精神已遭破壞，故雖有 國父良好之恢復倫理思想計劃，亦難實現。總統秉承遺志，洞察大局，乃領導北伐，統一全國，手光復之臺灣，爲反攻復國的根據地，並積極提倡恢復倫理道德，以爲精神武器。故 總統之豐功偉業，及其對中國倫理之貢獻，與其所遭遇時世之艱難，實史無前例。茲將 總統之倫理思想，簡述如次：

總統不僅對國父的思想研究最為澈底，而且對中國經典哲學也有貫徹的認識；所以他能全盤的接受國父的思想而加以實踐。他的倫理思想，是以「人」為中心，主張從修身做起。他對於修身的指示極多，茲舉一節以見一斑。他說：「修省的工夫，是做人尤其是做軍人的最重要的智能。從今以後，我們要能够齊家治國，恢復我們的民族地位，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而修身之道，即在發揮仁義禮智信之天性，其用功之處，即在使我們日常生活之衣食住行一切皆合乎禮義廉恥。」因為他要人修身，所以他倡導「新生活運動」；其次他主張孝順。他本人事母人王太夫人至孝，這是全國人都知道的。所以他真正的做到以「孝」教國人。他說：「父母生養我們，教育我們，以至於成立，愛之護之，無微不至，真所謂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我們對於父母，那裡可以不孝順！如果對於父母不孝，對國家必不忠，所謂『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我要能行道於天下，必先行孝悌以事父母兄長。孟子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這就是講孝順為事親之本。」總統更主張，既生而為人，就要發揮做人的道理，他說：「人生於世，不過匆匆數十寒暑，必須要發揮能力，貢獻於國家人類，方為毋忝所生。」所以他主張「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因此，他更進一步主張，要發揚個人生命，以為民族的生命。他認為個人生命全在民族的生命之中，只要民族生命存在，個人生命即可不死。他又說：「我們一個人的生命，窮本溯源是整個民族生命延續中之一分，同時又是整個民族生命繼續開展的一點，因此可以說我們的生命向上追溯，就是敬仰祖宗的生命；往下推演，就是未來無窮子孫的生命。所以我們的生命乃是整個民族生命長流中之一點，只要這個偉大的民族生命長流不滅，我們的生命便是永久不死。」所以總統的倫理哲學，是以「人」為中心，再由人而推演至整個的民族。這個卓見是從來很少有人提過的。

總統之提倡新生活運動，乃是鑒於國民精神之委靡，生活之散漫，欲以矯正一世之習俗，而納諸規範。以禮義廉恥為標的，振起固有的倫理精神，從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為原則，使易於實踐。規定具體項目，以養成國民有規律的生活；同時啓發其理性，以期自動實踐倫理道德。當時他揭示禮義廉恥的行為標準為：禮、就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就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就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就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當抗日戰爭期中，又頒佈「精神總動員」，此與「新生活運動」，意義一貫，同爲改造國民生活，振作社會風紀的運動。

如果說明其不同之點，新生活運動，是適應國民平時生活而產生；精神總動員則爲適應戰時生活而產生。精神總動員的目標是：（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二）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其改造精神之要點爲：（一）糾正醉生夢死之生活。（二）養成奮發蓬勃之朝氣。（三）革除苟且偷生的習性。（四）打破自私自利的企圖。（五）糾正紛歧錯雜之思想。此時對禮義廉恥的標準則爲：禮，要進到嚴嚴整整的紀律；義，要進到慷慨激昂的犧牲；廉，要進到切切實實的節約；恥，要進到轟轟烈烈的奮鬥。這裡每一句中都有「進到」二字，便是以新生活中之禮義廉恥的標準，而「進到」精神總動員中禮義廉恥的標準。

政府遷臺之後，總統一方面領導國人積極的建設臺灣，以爲反攻復國的根據地；一方面鼓勵軍民，發揚倫理精神，以爲消滅共匪的精神武器。十餘年來，他對倫理的訓詞極多，難以枚舉。其中最重要者，如對國民則有「國民公約」及「國民動員月會」；對青年則有「革新、動員、戰鬪」；對軍隊則有「新武德」「五守運動」及「五大信念」；對教育則有「變化氣質」「明人倫」「尊師重道」及「生活教育」等等，至於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各方面，亦皆因應時勢之要求，而有各項重要之文誥。皆本於倫理精神之發揚，建國復國之需要。

總統復鑒於倫理在於實行，始能表現力量，故於早年即提倡「行力哲學」。他以爲人生自少至老，在宇宙中間，沒有一天可脫離「行」的範圍。由「行」而充實了人格，提高了人格。一切聖賢英傑，革命志士，因爲能有目的有決心的去「行」，所以能達到他們的志願，完成最高尚的人格。他主張要認識「行」的真諦，最好從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一句話上去體察。吾人能取法於天，自然奮發興起，貽勉不輟，明白人生在宇宙間的地位和價值，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這樣就必然做到「至誠專一」。所以，他的力行哲學的精義是本於「誠」，他常引用中庸上「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兩句話，說明宇宙人類所以能永遠生存，不斷進步，全是這個「誠」字的力量。

他又認爲「知本於天性，行發於真知」。因此他主張「力行」就是「窮理研機」，就是「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

意初動之時。」所以他認為只有「篤信力行」，才能實現 國父的三民主義。他又擴大「力行」的意義，認為「力行」就是革命。革命的動機是救人，革命的本務在行仁。所以「力行」就是革命，也就是行仁。行仁的極致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因此「力行」是為求民族的生存，國民的生計。這是他的知行合一的理論，似乎比 國父的知而後行的學說更進了一層。 總統的力行方法，他說：「（一）必須有起點，（二）必須有順序，（亦即有系統、有條理、有計劃，就是科學的）（三）必須有目的，（四）必須是經常恆久的。」所以力行的結果，就是實踐。

由以上 國父與 總統對於中國倫理的發揚及實踐看來，中國倫理思想不但正向復興的路上邁進，而且都比歷代聖哲所講的，更為發揚光大，並且把倫理看作教民建國的大道，這是歷史上少見的事。所以我們承認中國倫理在今日又步入復興之路，於反攻復國前途，增加了無限的希望。

三、中國倫理之精神

中國倫理自堯舜倡導以來，已四千餘年，隨國運之盛衰，而呈起伏之象，其演變已如前文所述。然中國倫理思想，深入人心，其影響力至大。試觀歷代興亡之蹟，莫不源於倫理精神之消長以促成之。竊嘗研討其影響何以如此之大，深入人心何以如此之深，蓋有故焉。其故維何，曰：中國倫理所特具之精神是已。

中國倫理之精神有五：（一）人本精神，（二）中的精神，（三）仁愛精神，（四）平等精神，（五）王道精神。人本精神者，倫理之體也；中的精神者，倫理之用也；仁愛精神者，個人倫理之基礎也；平等精神者，社會倫理之準則也；王道精神者，國家倫理之目標也。所以中國倫理以「人」為本，以「中」為用，然後由個人推而至於社會國家，形成一完整之體制。這是中國倫理的特色，也是中國倫理的精神所在。茲分別述之如下：

（一）人 本 精 神

中國倫理以「人」爲中心，故發展而爲傳統的「人文主義」。人文主義的精髓爲「人性」，人文主義的表現爲「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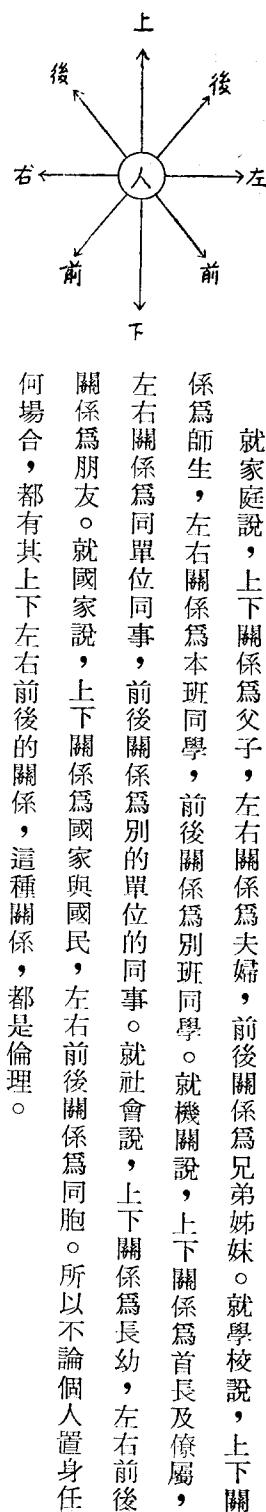
「人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就是因爲人有「人性」。

甚麼是「人性」？「人性」就是「人」的「性」。所謂「性」，是人類以至萬物，先天生而有者也；故子思云：「天命之謂性」。（見中庸）按生物學的說法，「性」（Nature）是與生俱來的。我國孟子與荀子皆談「性」，孟子謂人性本善，其惡由於物慾；如人性爲物慾所蔽，即不能發揮其善，遂至於惡。故孟子主張「求放心」，主張「養氣」，主張「寡慾」。荀子謂「人性皆惡，其善者僞也。」又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而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見荀子性惡篇）孟荀二子的意見，恰好相反。以現代心理學觀點看來，所謂「性」，是一種自然的本能，無所謂善，亦無所謂惡；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所以子思主張修道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就是倫理的表現。孟子的學生告子，也有同樣的意見，他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見孟子告子篇）告子之意，以爲人性如湍水，可東流可西流，本無善惡之別，導之不同，乃有善惡之分。這種看法，頗合於心理學的原理。

這裡子思所謂「修道」，告子所謂「決水東西」，皆指「理性」而言，「理性」是「人性」的發揚。人類一切活動，皆始於「人性」而歸於「理性」。就個人方面說，「理性」是一種合於義理的推動力；就社會方面說，「理性」是人類活動的共同法則或理則。「人性」是天生的，「理性」是教育的，所以「人性」是倫理的由來，「理性」是倫理的表現。章學誠云：「三人居室，而道生焉。」（見文史通義原道）這個「道」就是倫理，倫理本是人對人的關係，故人與人相處，就產生倫理關係。此道此理，賴人在宇宙間不斷的修進，就是孔子所謂「人能宏道」的意思。倫理作用，在於修進人在宇宙之間的種類關係及其活動的法則，而使之臻於至善。

再進一步言之，中國倫理爲人與人相處的關係，則人類生活不論其是在家庭、學校、機關、乃至社會、國家，都有其立體

的關係。所謂立體關係，就是一個人的上下左右前後的關係。這個關係是以「人」為中心的。如下圖：



在人為中心的倫理關係中，其本身必須健全，所以「修身」成為做人的第一要義。孔子認為「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切倫理的基礎，在於修己，在於完成個人的人格。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中庸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便是發揚「人性」和發揮「理性」，所以修身是實踐倫理的基本工作。

修身之道，要從致物致知、誠意正心做起。格物致知是充實知能，誠意正心是端正觀念。根據心理學的解釋，觀念端正則思想正確，知能充實則經驗豐富，由思想支配經驗而表現的行為，必然是合理的行為；此種合理行為的整合(Integration)即為完美的人格。人類生活既有上下左右前後的關係，要各種關係都能適應得很好，必須要有確定的完美人格，才能適應得恰如其分；過與不及，皆非所宜。一個人在其上下左右前後的關係中，如果有一方面適應得不好，就會影響到另一方面。曾子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前後；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見大學）可見適應各方面的關係是如何的重要了。一個人有良好的修身，表現出完美的人格，則不論在任何場合，面對任何人，都能守其份而盡其責，這便是人性與理性的表現，也就是倫理的表現。

(二) 中 的 精 神

人類倫理的最高原則為一「中」字。論語堯曰篇云：「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這裡「兒執其中」的「中」字，是倫理的基本原則。舜亦以此授禹，且增加了三句話，意義更為明瞭。舜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充執厥中。」（見尚書舜典）所以「中」的原則，歷經夏、商、周三代，成為中國倫理的最高原則，至子思乃成中庸一書，歷代先哲所授者，亦皆本此原則而發揮。

儒家倫理思想，即以「中」為中心。究竟「中」是什麼？後代學者有種種解釋。如子思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程子謂：「不偏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子謂：「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均見中庸）後儒對於「中」字更附以種種哲學意味。實則「中」字意義，並不深遠高妙，不過當事之際，不使其流於極端，取其適宜的方法而已。

「中」為堯舜的根本思想，僅止於形式的理想，其欲使人人實踐「中」之理想，則不得不提出具體的德目。倫理德目即由是而產生。首先提出的是舜，舜使契為司徒而佈五教，是為中國正式的倫理教育之始。（上文述過）所以「中」實為人類倫理實踐的根本精神。人類倫理必須循「中」的原則，始得調和適合。因為人類生而俱有各種需欲，復有各種情緒，若不加以節制、調和，則欲望無窮，情緒激動，紛爭不已，社會永無平靖之日，人類還能談得上安定的生活嗎？先哲有鑒及此，所以提出這個「中」字，以為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使一切思想行為合理化，可以說「中」亦即前面所說的「理性」。故臯陶本夔之四德，（一）寬而栗，（二）柔而立，（三）直而溫，（四）簡而廉，（五）剛而塞，（六）強而義。可見夔之四德及臯陶之九德中，每一德都充份地重視「中」的原則，也就是「理性」的表現。

至於「中」的應用，見於禹之洪範九疇中。九疇中之『三德』，就是「正直」「剛」「柔」三個德目。「正」則無邪，「直」則不曲，其平衡不需矯正者，導以「正直」之德，即可得「中」。然不得平衡而需矯正者，則有「剛克」「柔克」的必要。所謂「克」，就是「治」的意思。即強硬不順者，以剛德治之，使其得「中」，這是以「剛」治「剛」；和柔委順者，以「柔」治之，使其得「中」，這是以「柔」治「柔」。有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治之，使其得「中」，這是以「剛」治「柔」；有高亢明爽過於「中」者，以「柔」治之，使其得「中」，這是以「柔」治「剛」。總之，三德治人，皆是「因

人而異」，「因時制宜」，目的在使人合於「中」而已。

「中」與「和」亦有關係。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就「中」與「和」言，「中」爲體，「和」爲用，體用兼備，名之中和。故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達至誠之境地矣。所以在「中」的應用時，須以「和」爲主，人必須致中和，方能達到「誠」的境地。能「誠」，就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而達倫理之極致。

(三)仁愛精神

中國倫理，以「人」爲中心，故一切倫理之發輶，皆自個人始。個人的倫理基於「仁愛」，「仁愛」爲倫理的基本精神，可以推之於家庭、社會、國家者。

「仁愛」二字的意義，本屬一體的兩面，蘊於內者之謂「仁」，發於外者之謂「愛」。孔子雖只講「仁」，但「愛」都包括在內。本來「仁」是二人相偶之意，就是「愛」的意思。六書正偽云：「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仁也。」可見「仁」是作人基本條件，作人如果內不存仁，外不示愛，則與禽獸何異？所以「仁愛」是作人所不可少的。「仁愛」推至極點，便是「仁民愛物」，以天地萬物爲一體。

仁爲諸德之本，孔子孟子皆懸仁爲後人修養標準。老子亦云：「天地與吾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見老子）張載亦云：「民吾胞也，物吾與也。」（見西銘）皆說明仁愛的重要。人有仁愛之懷，就能「立己立人」，利民澤世。仁之含義有五：（一）慈愛、（二）利澤、（三）重厚、（四）忠恕、（五）克己（制慾）。慈愛就是憐憫，如樊遲問仁，孔子曰：「愛人」。（見論語顏淵）利澤就是利人澤世，如子張問仁，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見論語陽貨）厚重就是以身作則，感化人民，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見論語泰伯）忠恕就是忠恕之道，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

語中以仁用爲忠恕之道者不少，故認忠恕爲「一貫之道」。克己就是反省制慾，如「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見論語顏淵）又云：「仁者先難而後獲。」（見論語雍也）以上所舉仁之五義，有相互密切之關係。慈愛爲仁的本義，有慈愛自能厚重而忠恕。慈愛的效果，爲利澤；欲達此必須克己，故仁愛之意義，推至極點，即是「利他主義」。

由上所論，可知仁愛爲倫理之基本，個人守此基本，即可立身處世，待人接物，無往而不宜。再推而廣之，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易經序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可見仁愛的起點，始於家庭；而家庭的仁愛，則始於孝悌。故培養仁愛，宜從孝悌入手。

所謂「孝」是敬愛親長，所謂「悌」，是友愛兄弟。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見論語）又說：「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見論語）可見孝悌不但是作人的基本，更是立身處世的圭臬。

孝爲百行之本，置諸德之首。故「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見孝經）蓋孝爲人性固有，父子之道爲天性。悌者敬也、恭也、友也，詩云：「愷悌君子」，是能恭敬而友愛者，則爲君子。前面說過，仁愛的出發點爲孝悌，實則能孝能悌，皆出自內心存仁，藉孝悌以表現之。因爲子女對父母盡孝，兄弟互相友愛，乃已身與一切生命相感之起點，也爲對一切人與物盡責任的起點。仁愛之推行，道德之實踐，都是建立在對人對事對物的一片敬愛的真心之上。這一片敬愛的真心，最根本最切近處是發端於父母子女兄弟之間。人人爲了要愛父母、愛兄弟、愛家庭，推而廣之，便是愛鄰里、親友、而至國家民族。所以曾子說：「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皆爲不孝。」（見孝經）可見「孝」的廣義，就是修身、事君、爲政、交友，作戰等各種道理。「悌」也就包括在內。這便是家庭倫理道德融攝一切國家社會的倫理道德。因此，由仁愛涵蘊的家庭、社會、國家、人類，自然圓滿美善而成爲渾然一體之仁愛。所以仁愛是中國倫理

的精神之一。

(四) 平等精神

個人與他人相處之關係，皆屬社會行為。社會行為之發展，則為社會倫理。社會倫理以「平等精神」為骨幹，而社會倫理係由家庭倫理推演而成者，故家庭倫理以至國家倫理，亦皆本於平等精神而建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名分雖有分別，實則皆基於平等精神，這是中國倫理的特色。

就君臣關係說，其職位雖有上下之分，其人格都是平等的。如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語），這便是君臣之間，地位儘有不同，職責雖有不同，但人格却沒有差別。春秋時代，宋國發生天象對國君景公不利。司星子韋向景公建議說：「可以把禍事移在宰相身上。」景公說：「宰相是我的股肱，那怎麼可以呢？」子韋說：「可以移到人民身上。」景公說：「國君是替人民做事的，那又怎麼可以呢？」子韋又說：「可以把禍事移到年歲收成上。」景公說：「歲饑民困，我還做什麼君主呢！」結果宋景公不顧災禍而毅然拒絕了司星的請求。這一事實恰是君臣人民一體的說明。可見君臣一倫，是建立在人格平等之上。

就父子關係說，父子名分有上下之分，其人格亦皆平等。就名分言之，子對父應該孝，父對子也應該慈。但就責任言之，父對子應加教誨，因為這是為父的責任，而不是為父的特權；父母有過，子女也要勸告諫爭，這不是為子女的冒犯尊長，而是為子女的責任。所以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論語）曾子也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見孝經）普通人只知道子女對父母要孝敬，父母對子女要慈愛，而中國倫理則主張子女於孝敬父母之外，也要幾諫父母之過；也主張父母於慈愛子女之外，更要負起教導之責。如此互相慈孝，互相敬重，這是父子之間人格平等的明證。可見父子一倫，建立在責任平等之上。

就夫妻關係說，更充分的表現平等的精神。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見嫁娶篇）說文：「妻、婦與夫齊者

也。」可見中國人很早就具有夫妻平等的觀念。至於夫妻分擔的職務，在中國過去也看作同等重要的。易經家人卦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見家人卦象辭）這番話說明夫婦分治內外，都極重要。治國平天下，皆自正家做起，而正家又自夫婦平等，分治家務做起。可見夫妻一倫，完全建立在義務平等之上。

至於兄弟，朋友的平等精神，更為明顯。兄弟之間，如手足，同氣連枝，合作互助，以友愛為本。朋友之間，如兄如弟，道義相尚，德業相期，切磋砥礪，規過勸善，以信義為本。故兄弟之間，朋友之間，皆是以平等立場相處。可見兄弟一倫與朋友一倫，也都是建立於平等精神之上的。

（五）王道精神

中國倫理於政治方面表現出來的，則為王道精神。所謂「王道」，別乎「霸道」而言。孔子認王道是仁政，故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見論語為政論），孟子認王道是王政，故曰：「王若行王政，民之歸也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見孟子梁惠王篇）用現代術語來說明，「王道」就是重義務而輕權利，貢獻於國家人類者多，而求取於國家與人類者少。這便是王道的精神。中國倫理，要求於政治領導者，便是「王道」。自古以來，即是如此，因此中國自古就是重「王道」的國家。

王道精神，重義務而輕權利，故推行王道，必能深得民心，獲致民衆的擁護。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亦且知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得不可而居也。」（見荀子王制篇）這段話說明了人類合羣的重要。至於最善合羣的人，便是推行王道的人。所以荀子又云：「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

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羣。不能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見荀子君道篇）這一段話是說明推行王道的人必能得到擁護。善生養人，便是能解決民生問題；善班治人，便是能組織管理民衆而發揮民權；善顯設藩飾人，便是能使民族國家光榮昌大，而提高民族地位。具備此種條件的政治，便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仁政，孟子所理想的王政了。而能推行此王道政治的首領，自然得到全國的尊崇與擁戴。

此等推行王道的領導人物，乃是最能發揮仁性的人。他們痼疾在抱，以天下爲己任：堯有天下，痛萬民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見賈誼新書）舜以務民爲首；（見尸子）禹治洪水，八年於外，三過家門而不入；（見孟子）商湯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見尚書湯誥）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遙，不忘遠。（見孟子）足徵古代聖王重義務而輕權利，貢獻多而求取少，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皆仁者所不爲。於此可見王道精神，是以服務羣衆爲出發點，而以造福社會國家爲目的，這便是中國倫理的偉大處，也是中國倫理精神之所在。